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通史教程

主编 姜义华

第三卷

元明清时期

本卷主编 陈支平 陈春声



博
学
·
史
学
系
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通史教程

主编 姜义华

第三卷 元明清时期

本卷主编 陈支平 陈春声
本卷编撰 王 颀 陈支平
郑剑顺 范金民
王日根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教程. 第3卷, 元明清时期/姜义华主编; 陈支平, 陈春声本卷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09-04799-0

I. 中… II. ①姜…②陈…③陈 III. ①中国-通史-高等学校-教材
②中国-古代史-元代-高等学校-教材③中国-古代史-明代-高等学校-教材④中国-古代史-清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728 号

中国通史教程 第三卷 元明清时期

姜义华 主编 陈支平 陈春声 本卷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装帧设计 孙曙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443 千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100

书号 ISBN 7-309-04799-0/K·172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本卷几个问题的说明

姜义华

在本书第一卷作为代总序的《〈中国通史教程〉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对于第三卷《元明清时期》有一段概括性说明,其文如下:

第五,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时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中国与欧陆文明,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在本卷即将付印之际,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先行申述一下。

关于本卷所述历史阶段的时间下限问题

如上面引文中所述,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时间大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下限即通常所说的清道光年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本卷于第二章“明至清道光时期概述”之后,又专设一章“晚清时期概述”,将时间下限延至清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冲击,已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但直至清王

朝灭亡,变化仍停留于局部范围、局部层面。中华民族向现代民族转型、中华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从局部走向全面的进程中,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共和制度所推翻,仍应被视作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本卷时间下限与第四卷时间上限便有所交叉:本卷延续至清王朝皇冠最终落地,而下一卷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上溯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动,特别是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新型革命运动的崛起。

关于元王朝和清王朝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地位问题

在本卷所叙述的600多年历史中,由蒙族和满族所分别建立的元王朝和清王朝统治今中国版图约360年。人口庞大的汉族和现今中国版图内其他众多族群,在这期间,都处于人数虽少却拥有大量特权的蒙族和满族的主宰之下。元末明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曾被用来动员人们奋起推翻元王朝统治;而清朝末年,它又被用来动员人们奋起推翻清王朝统治。在这一口号的鼓吹者心目中,蒙元、满清俱“非我族类”,不是“中华”的一部分,应置于被排拒者之列。宋、明王朝以汉族为统治民族,因此,凡以死效忠于宋而不屈于元者,或以“恢复中华”为名起而反元者和坚持反清复明者,都被认定为汉民族的“民族英雄”。至今,也仍有一些人强行将蒙元和满清两个王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这一范畴中剔除出去,他们或者根本不承认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客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共同体的实际存在,或者执拗地将中国划定为仅仅由汉族所独有。

然而,事实证明,正是经历了元王朝、明王朝和清王朝,涵盖中国现今全部版图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方才不可动摇地在亚洲东部大地上真正确立。历史发展进程清楚地表明:尽管汉民族是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力量,历史的中国却并非由汉族单独创建而是由中华各族群共同缔造的。蒙、满等族群不仅使中国空间范围扩大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空前广大领域,而且依靠他们和其他草原—游牧族群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相近相通乃至同构化的特殊优势,引领和促进了这些族群对于汉族所主导的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认同,加深了各族群彼此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交流,大大强化了中华国家各族群的凝聚力。

元王朝和清王朝对于中国统治的建立,凭借的是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的军事征服,而这一统治的维系与巩固,又始终未离开血腥的暴力,它们曾

经给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及其他族群带来沉重的苦难。不过,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结束时引用歌德的诗句所说:“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人类的进步,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经历了痛苦。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同样并非充满了友爱与牧歌。元王朝和清王朝的建立,在制造了巨大灾难的同时,又使边区各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形成空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从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上使居住在地域更为广阔的边区各民族和中原汉族统一在同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的条件走向成熟。元王朝和清王朝充当了完成这一历史必然使命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

一直专注于农耕文明自身发展的汉族素来安于适宜农耕的中原地区,缺乏向广大草原与深山老林开疆拓土的内在动力与实际能力;然而,当边区各民族和中原汉族统一在同一个中央政权之下时,汉族又实实在在地从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特别是经济上、财政上构成了维系和保障这一中央政权的稳定基础和核心力量。蒙古族的崛起代表草原—游牧文明的强盛,蒙族骑兵纵横于欧亚大陆,开拓了空前广大的疆土,但却缺乏使这些疆土较长时间统一于同一中央政权之下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雄厚基础。元王朝建立后,虽然吸取和沿用了唐、宋以降经济、政治、文化若干制度,在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方面的成绩已远远超过同时期北亚、中亚、南亚其他蒙族诸国,但元王朝仍过多受制于各蒙族汗国共同固守的传统草原文明与传统游牧制度,未能有效地保护和发挥中原农耕文明和大一统制度的核心和基础作用,结果,王朝统一未能维持多久,国家便陷入动乱,而蒙族主要部分最终还是撤往漠北蒙古大草原。与之相较,满族无论在建立大一统王朝过程之中,还是在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王朝之时,虽然有过“留发不留头”一类野蛮举措,但比起蒙元朝来则更为自觉地注意有效发挥汉族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传统制度的积极作用,并以此作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基础和中心支柱,这就使清王朝既保持满族开疆拓土和联系各边疆民族的特殊优势,又充分利用中原成熟的农耕文明,创造了所谓“康雍乾盛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称,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32%,居世界首位;而欧洲英、法、德、俄各王国其时经济总量合计只占世界份额的17%,只有中国的一半稍多。这类统计的可靠性、准确性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清王朝延续了268年,其成功的秘诀也许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追寻。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专家王尔敏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

一文中认为：

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定，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①

元、明、清三代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发展的历史实际更为有力地表明上述论断具有充分的根据。中华各族群的血缘联系，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惠互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融合，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确立，离不开汉民族的伟大贡献，也离不开蒙族、满族以及其他边疆各民族的伟大贡献。不同民族之间发生过不少激烈的冲突，同一民族之中也发生过大量激烈的冲突，但是，冲突只是彼此关系之中的一个侧面，历史发展最终还是使各民族汇合成具有相同命运、相同利害关系的中华民族，并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撰写者所持的既不是传统的汉族本位立场，也不是大蒙古族本位或满族本位立场。我们力图客观地展现现今中华各民族在塑造历史的中国与中华民族进程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当然，这仅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中各大重要事件、重要决策、重要活动作出充分而准确的评价，还有待发掘更加丰富的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或“初期工业化”问题

西方列强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很多人对中国也将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传统社会视为理所当然。不过，中国人在接触西方文明时，外国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使许多人对资本主义是否为中国所必经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怀疑。中华文化“致中和”的文化基因，天然地排斥以“优胜劣汰”为其生命内核的资本主义。于是，避免资本主义，经由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从传统文明走向

^①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台北），1977年，第443～446页。

现代文明,从20世纪初开始绵延整个世纪,一直成为许多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执著追求。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中国是否经历过或应否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曾被尖锐地提出来,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有学者提出,中国从战国时期以来就已进入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异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明清之际,资本主义都市经济的成长和市民社会、启蒙思潮的出现,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初起时期相类似的新的的重要因素。这就提出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说:

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在这篇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题的文章收入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对此段论述作了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一句里,三千多年改为“三千年左右”;“重大的根本的变化”一语删去了“根本的”三字;最重要的修改,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语之前增写了一段:“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后面说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时,又特别将“发生”二字改为“发展”二字。

这段新的论述,不仅肯定了中国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断定,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一论断,使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必经的历史阶段,于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则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可是,“资本主义萌芽说”有一致命的弱点。如果像欧洲那样以协作劳

动及雇佣劳动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那么,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便如许多学者所论定那样,可以上溯至宋代、唐代、两汉甚至战国;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时相比,中国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都曾发展到毫不逊色的很高程度,但是,中国却并没有由此产生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没有由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设。而中国随后历史发展则证明,即使有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在若干区域、若干领域出现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中国仍无法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们开始逐步摆脱了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一元直线进化”历史发展模式影响之后,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改以“初(早)期工业化”理论来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江南手工业经济,以“生产过密化”来解释明清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为什么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

本书对基于欧洲经验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持存疑态度,不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适用于世界所有其他各种文明、尤其是已达到非常成熟程度的中华文明。因此,本书未将中国明清社会与经济发展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强行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资本主义这一范畴,而期待通过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以得出充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结论。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伟大飞跃的成功实践,非常雄辩地告诉我们,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必须的,但不能机械地用某一种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模型来剪裁自己的历史。我们需要认真地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其演进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方才能够真正弄清哪些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哪些东西只具有局部的或个别的意义。

关于本卷撰写

本卷主编为陈支平(厦门大学)、陈春声(中山大学)。

各章编撰者为:

第一章 王珣(暨南大学)

第二章 陈支平(厦门大学)

第三章 郑剑顺(厦门大学)

第四、第五章 范金民(南京大学)

第六、第七、第八章 王日根(厦门大学)

第九章 王颢、范金民、陈支平

第十章 王颢、王日根、陈支平

全卷成稿后,由陈支平、陈春声先后通稿。除姜义华审读全稿外,还特请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范金民(南京大学)、邱捷(中山大学)诸教授审读原稿。蒙他们提出许多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王日根教授又对本卷脚注作了若干要素补充。吴仁杰编审在对各章进行编辑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谨此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再次热忱地诚恳地期待读者给予批评和提出建议,以利对本书作进一步修改。

目 录

关于本卷几个问题的说明·····	姜义华	1
------------------	-----	---

第一章 元时期概述·····	王 颢	1
----------------	-----	---

第一节 漠北合一和蒙古国的征战·····		2
----------------------	--	---

一、蒙古的起源与漠北的统一·····		2
--------------------	--	---

二、蒙古国的征服战争·····		4
-----------------	--	---

三、漠北的建设与汗国的分裂·····		7
--------------------	--	---

第二节 元朝的建立与社会政治·····		9
---------------------	--	---

一、元朝的建立与中国的统一·····		9
--------------------	--	---

二、政策的演变与帝位的争夺·····		11
--------------------	--	----

三、短暂的改革与政治危机·····		13
-------------------	--	----

第三节 民族压迫与民族融合·····		16
--------------------	--	----

一、推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		16
--------------------	--	----

二、民族融合的缓慢进程·····		19
------------------	--	----

三、边疆治理与经济文化建设·····		21
--------------------	--	----

第四节 社会动乱与元朝的灭亡·····		23
---------------------	--	----

一、社会矛盾激化与白莲教的传播·····		23
----------------------	--	----

二、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方割据·····		25
---------------------	--	----

三、朱元璋削平南方势力和北伐大都·····		28
-----------------------	--	----

第二章 明至清道光时期概述	陈支平 31
第一节 从“洪永盛世”到宦官专权	33
一、明初的由乱入治与“靖难之役”	33
二、从正统到正德年间政治格局的演变	37
三、明中期的吏治败坏与社会矛盾	41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王朝更替	44
一、嘉靖万历年间的内阁纷争与张居正改革	44
二、明末的政治没落与北边危机	48
三、农民大暴动与清兵入关	51
四、南明政权的覆灭和郑成功收复台湾	54
第三节 暗潜危机的“康雍乾盛世”	55
一、清朝前期的统治政策	55
二、边疆管理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58
三、思想控制与百年“文字狱”	61
四、清朝国力由盛入衰的逐渐转化	63
第四节 嘉庆道光年间的社会政治危机	66
一、统治阶级日益衰败	66
二、财政亏空,边防废弛	68
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70
第三章 晚清时期概述	郑剑顺 74
第一节 外国列强叩关与侵华战争	75
一、鸦片走私与鸦片战争	75
二、英法联军侵华战争	79
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83
四、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86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与民众抗争	94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94
二、各地的反洋教斗争	97

三、义和团运动	100
第三节 统治危机与维新变法	103
一、辛酉政变	103
二、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	105
三、维新变法运动与戊戌政变	107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典章制度	范金民 112
第一节 政治制度	114
一、中央政治体制	114
二、地方行政制度	119
三、教育科举与官员选拔制度	124
四、法律制度	130
五、军事制度	133
第二节 经济财政制度	137
一、土地制度与地租形态	137
二、赋税徭役制度	141
三、财政与金融制度	147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	范金民 152
第一节 农业的缓慢进步与边疆的开发	154
一、农作物的改进及经济作物的推广	154
二、农业技术的迟滞与生产的起伏	158
三、农田水利与边疆开发	162
四、林业、渔业和畜牧业	167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的转型和发展	171
一、官营手工业向民间手工业的转变趋向	171
二、手工业生产的拓展与局限	176
三、手工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	181
四、近代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186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活跃	190

一、国内贸易的发达与商品流通	190
二、地域商帮及其经营特色	195
三、城镇经济与市场网络	199
四、海外贸易与白银货币的发展	206
五、西方殖民势力冲击下商品经济的新格局	210
第六章 人口变迁与社会关系	王日根 215
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迁移流向	217
一、人口数量与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化	217
二、人口政策与国内人口迁移的类型	220
三、海外移民的激增及其流向	223
第二节 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	227
一、社会等级结构与阶级关系	227
二、贵族的兴衰更替与阶级关系的复杂化	234
三、生业的扩展与城乡关系的多样化	236
第三节 基层组织与社会管理	238
一、政府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演变及其衰落	238
二、乡族组织与宗法关系	242
三、民间宗教与秘密组织	249
第七章 社会生活与风尚习俗	王日根 257
第一节 婚姻家庭与日常生活	258
一、婚丧嫁娶	258
二、家庭结构	262
三、日常生活与消费趋向	263
四、运输、商路与交通方式	268
第二节 社会礼俗与民间习俗	270
一、社会礼俗的变化	270
二、岁时节令风俗	275
三、民间文化娱乐	276

第三节 社会风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差异·····	281
一、社会风尚的时代特征·····	281
二、社会风尚的民族与区域差异·····	282
三、“西风东渐”下的民俗流变·····	284
第八章 元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 王日根	288
第一节 理学的北传与心学的崛起·····	289
一、理学的北传及其官方地位的确立·····	289
二、心学的崛起与分化·····	290
三、理学异端与社会思想的发展·····	292
第二节 经世致用与西学为用·····	295
一、儒学的“由王返程”与实学的兴起·····	295
二、传统儒学的困境与更新·····	297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299
四、大同思想与民权启蒙·····	304
第三节 宗教传播与中西冲突·····	307
一、“也里可温”与耶稣会士·····	307
二、“礼仪之争”与禁教令·····	311
三、不平等条约下的传教活动·····	311
第四节 文学艺术的发展·····	314
一、元代杂剧及散曲的成就·····	314
二、明清小说与其他通俗文艺·····	318
三、晚清小说的发展与变化·····	321
四、绘画与书法艺术·····	322
第五节 史学成就与汉学兴衰·····	327
一、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327
二、乾嘉汉学的兴盛与衰落·····	330
三、官方学术及类书、丛书的编纂·····	332
第九章 科学技术的缓慢进步····· 王 颀 范金民 陈支平	335
第一节 元代的科技成就·····	336

一、郭守敬与《授时历》·····	336
二、王祯与《农书》·····	337
三、地理勘测与《舆地图》·····	339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	341
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达·····	341
二、明代后期的科技进步·····	345
三、清代科技的缓慢发展·····	351
第三节 晚清科技向近代化的转变·····	355
一、军事工业中的科技水平·····	355
二、民用机器工业与近代科技·····	359
三、近代科技知识与专门人才·····	363
第十章 元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 王 颀 王日根 陈支平	365
第一节 元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366
一、元朝与钦察、伊利汗国的关系·····	366
二、元朝与亚非各国的关系·····	370
三、元朝与欧洲的关系·····	375
第二节 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自守·····	377
一、郑和下西洋与朝贡贸易·····	377
二、沿海倭患与抗倭援朝·····	384
三、鸦片战争前清朝的闭关自守·····	389
四、中俄边界与东正教布道团·····	392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的屈辱外交·····	396
一、不平等条约的严重后果·····	396
二、国力衰退下的外交机构·····	398
参考书目·····	401
插 图	
图 1-1 蒙元骑兵战斗图·····	4

图 1-2 元世祖忽必烈像	10
图 1-3 元成宗铁穆耳像	12
图 1-4 八思巴见忽必烈图	22
图 2-1 明太祖朱元璋谕旨	33
图 2-2 山海关为明代长城关隘之一	36
图 2-3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图	37
图 2-4 清圣祖康熙像	58
图 2-5 清朝廷接受少数民族进贡图	59
图 3-1 晚清时期广东伶仃洋上停泊的英国鸦片走私趸船	75
图 3-2 林则徐像	76
图 3-3 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图	78
图 3-4 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两处遗迹	81
图 3-5 甲午海战中清军主力舰“镇远”号	89
图 3-6 台湾军民在新竹抗击日本侵略军	91
图 3-7 李鸿章像	105
图 3-8 康有为像	108
图 4-1 元代八思巴文谕旨	115
图 4-2 清乾隆时江苏巡抚徐士林所用印鉴	121
图 4-3 清代潮州揭阳县学宫	124
图 4-4 明洪武四年户帖	143
图 4-5 明代宝钞	149
图 5-1 元代水转连磨	159
图 5-2 明代织金妆花龙袍料	173
图 5-3 清嘉庆帝任命苏州织造敕谕	176
图 5-4 清代沙船	179
图 5-5 清代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址	198
图 5-6 明代《南都繁会图卷》(局部)	200
图 5-7 清代《盛世滋生图》(局部)	201
图 5-8 清代《节日集市图》(局部)	204